

提升人力資本以強化國際競爭力的新移民子女教育政策之探討

許誌庭*姜添輝**

摘要

世界經濟體系下，國家競爭力有賴國民具高度的多元文化能力，以能與眾多不同文化體系交往。隨著南洋籍婚姻移民數量的增多，及新移民子女步入學校接受教育，臺灣原有進一步發展具多元化特徵社會的機會，然而臺灣社會卻普遍將之視為文化低劣者，進而將新移民子女學業不佳原因，歸諸於資質不佳及母職功能的欠缺，而忽略了此些家庭所處的文化社會結構因素限制，亦未能體察所可能具有的學習優勢。

基於上述體認，本文藉由問卷調查法及焦點座談法，用以了解教師、新移民家庭對新移民學童學業狀況的看法，包括「對新移民子女學習與生活表現之認知」、「對影響新移民子女學業表現的成因之認知」，以及「對新移民子女獨特優勢條件之認知」等層面，以了解新移民子女面臨的學習困境及可能的潛在學習優勢，再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教育政策建議，期能提升其學習成效，進而強化台灣的人力資本，以提升我國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的國際競爭力。

關鍵字：人力資本、新移民子女、學習優勢

*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為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Email: tnkgb@mail.nutn.edu.tw

**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Email: thchiang@mail.stust.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4 月 25 日；修改日期：2015 年 11 月 4 日；接受刊登：2015 年 12 月 23 日

壹、前言

伴隨著巨額經濟利益的全球化體系已然建立，許多國家無法外自於此一體系，因而必須強化國際競爭力。致使許多國家須調整自身政策，以契合全球化經濟體系的需求（Dale, 2003），此種競爭力往往奠基於人力資本的提升，所以強化教育功能與全球化體系的關聯性（Lingard, 2000），已成為各國教育領域的重大發展策略。

然而由於全球化經濟體系背後的思維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其論點過度聚焦於市場效能法則，認為教育事務屬於個人理性與偏好選擇的範疇，所以政府應限縮其在教育的公共職能（Olssen, Codd & O'Neill, 2004）。因而忽視社會結構的影響，不均等教育結果顯示，家庭社經背景對學童學習表現產生深遠的影響（Bowles & Gintis, 1976），文化再製論（cultural reproduction）者進一步指出，學習表現並非個體心理條件的產物，而是個體本身吸納所處情境屬性，而發展出的理解與思考模式，此種文化能力與學術性課程屬性的契合度，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Bourdieu, 1990、2000）。另外從文化獨特性意義與社會評價的角度而言，弱勢文化並非源自本質性的缺陷，往往是社會權力壓制的結果，亦即優勢團體以此方式以維持既有的優勢地位。

上述關聯性指向，市場法則無法處理社會結構性的不均等，甚至會強化弱肉強食的社會問題。從另一角度而言，放棄文化不利學生不僅違背社會正義原則，同時也削弱國家的總體競爭力，因為這些學生是由於文化因素而未能有理想的學習表現，所以若能從社會文化角度著手，將能提升這類學童的學習成效，因而強化國家的人力資本。再者，此種貶抑使許多社會大眾無法了解這類文化的優勢本質，進而使社會文化喪失進一步融合與創新的可能性。

上述分析顯示，政府不應以市場邏輯看待社會結構的問題，當前新移民子女正處於高度的弱勢局面，這類學童亟待政府發揮職能以提升其學習成效。同時這類學童有更多機會傳承母親的外來文化以及語言。從正面角度而言，這些是台灣外交人員亟待強化的素養，所以若能掌握這類文化的優勢性，亦有助於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可積極提升新移民文化的正向功能與社會地位，進而改善新移民子女的文化不利地位，不僅可減輕社會負擔，並可轉化為積極性的人力資本。再者，這類學童人數眾多，在歷年新生兒總人數中佔據可觀的比率，若將之學業低成就視為理所當然而予以放棄，不但無法彰顯社會正義的訴求，同時也無法提升國家的總體人力資本。

基於上述體認，本文以問卷調查及焦點座談為研究方法，具體研究目的有二：
一、了解教師、新移民家庭對新移民學童學業狀況的看法，包括可能的學習困境及潛

在優勢。

二、提出相關教育政策建議，期能提升新移民學生學習成效，並開展學習優勢，進而強化台灣的人力資本及國際競爭力。

貳、文獻回顧

一、國際競爭力、人力資本與教育

由於全球化經濟體系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得許多國家必須調整自身以取得此種資本利益 (Dale, 2003)，這亦顯示全球化經濟體系已產生跨越國家主權的影響力，國家新的需求是強化國際競爭力，亦即新的世界體系使全球化經濟體系、國際競爭力、人力資本與教育產生密切結合 (姜添輝譯，2005；Lingard, 2000；Stromquist, 2002)。

國家競爭力的論述往往密切連結於人力資本論的概念，亦即強調藉由教育培育出更多專業人才，以契合全球化經濟體系的需求。此種需求反映出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之轉變。在早期階段，勞力密集是影響生產力的要素，之後是資本密集，繼而是技術密集，再之後伴隨全球化經濟體系的發展，新的要素是知識經濟，其特性不再是以往具有具體化或可觸摸的型態，而是具有高度彈性、應變力、創造力等，這些著重於契合動態社會需求的迅速服務，因而著重於知識的運用與創新，進而將社會推向以知識為生產力的新經濟型態，亦即新的全球經濟需求具有迅速學習，以及能用可靠與創新方式工作的工作者 (Morrow & Torres, 2000: 33)。

這種新經濟型態特徵不僅將社會推向知識本位，促使國家正改變其自身的功能與政策，亦包括教育目標的重新設定，因為學校是傳遞專業知識的主要場所 (Stromquist, 2002)。

Lingard (2000) 便認為自由市場的價值觀足以重構國家功能，從保護市民的社會責任轉向國際競爭力，以獲取更多的資本利益，所以社會福利被重新界定為特權，而非基本權利，國家的責任亦非以經費重分配的方式，為人民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或是追求更高層次的均等，新的任務是賦予社會成員受雇能力 (employability) 的個別性自我效能 (individual self-sufficiency)。

對受雇者能力的重新設定，指向教育的功能必須朝向滿足就業市場發展，這一連結使許多國家致力於教育擴張，以因應隨之而來的國際競爭。儘管如此，新自由主義

的政策取向，也涉及特定價值觀的建構，亦即教育、人力資本與國際競爭力之間的連結。一些學者指出，此種連結乃是美國透過國際與區域組織積極推銷人力資本論的思維所建構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扮演關鍵角色。原本 OECD 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組織，然而後來卻逐漸聚焦於教育議題 (Morrow & Torres, 2000; Rizvi & Lingard, 2006)，OECD 認定教育直接影響個別國家的人力資本之品質，此種品質進而影響其國際競爭力，國際競爭力更影響個別國家的經濟與國力。此種關連性使 OECD 致力於說服其會員國大幅擴張教育規模 (Rizvi & Lingard, 2006)。上述倡議的結果是使許多國家接受教育與人力資本論關聯性的論點，所以採取新的教育方針，亦即著重教育如何配合全球化經濟體系需求，以培育相關的人力資本 (Stromquist, 2002)。

上述現象顯示出，全球化經濟體系不僅影響個別國家的角色定位，同時也影響既有的教育目標與功能，因而導引出新的教育思維與政策。Säfström (2005)便指出，知識本位型態使國家轉移其焦點，基本上是從均等與社會福利等方面轉向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例如瑞典引進的終身學習方案，對其參與者的承諾是，終身學習能持續專業成長，進而契合全球化的新要求，若無法參加此一行列，終將被淘汰，這一論述逐漸轉變成社會盛行的價值觀，它不僅驅動社會成員的行為，並且也剝奪他們的分析與思考能力，對於相關的議題往往是理所當然的接受，而非反思後的行動。因此全球化產生以強化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國際競爭力為目標的教育政策，具體而言指的是培育出具有受雇能力的畢業生 (Olssen, Codd & O'Neill, 2004)。

新自由主義思維使國家遠離社會正義與公平的範疇，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義，其特徵是個人自我選擇：社會正義的價值觀已被個人選擇的價值所取代 (Blackmore, 2006: 218)。所以新的任務是賦予社會成員的個別性自我效能 (individual self-sufficiency)，具體而言是連結經濟層面的「受雇能力」(Lingard, 2000)。Olssen、Codd 與 O'Neill (2004) 也指出，此種新思維轉移國家權威，從公共服務與社會均等轉移到經濟層面的個體競爭力，所以國家將運作其權威，以將社會成員轉變成富有進取心以及競爭力的企業家。其所要建構的信念是：勞動者應是富有進取心、自我激勵或是自我掌舵 (Blackmore, 2006: 21)。此種新信念的主要訴求是職業市場的競爭力，所以許多學校或是學生轉向追求就業取向的功利主義 (Currie, 2004)。

二、文化再製論

上述分析顯示，新自由主義力倡自由市場的正面功能，因此政府不應擴張公共服務的職能，教育被視為屬於個人理性選擇的範疇。此種論點最大的缺失是，過度強調自由市場的競爭機能，因而忽略社會差異性，特別是弱勢族群並未具備足夠的能力進行個人偏好的理性選擇。系列性的相關研究證實，家庭社經背景明顯影響學童的學習表現，並且此種關聯性貫穿不同階段的學校教育，包括學前教育（林淑玲、馬信行，1983）、小學教育（許誌庭，2000；謝孟穎，2003）、國中教育（林義男，1993）、高中職的分流教育（楊瑩，1994）與繼續升學與否（薛承泰，1996）、高中資優生的背景組合（王文科，1999）、以及大學生的組合（轉自林生傳，2000）、或是明星大學的學生背景結構（駱明慶，2002）。

文化再製理論者認為，不均等教育結果是社會結構的產物，而非當事者心智能力或是個人偏好的產物。例如 P. Bourdieu 便指出，學生的理解模式能否契合學術性課程是影響成績的主因之一，他進一步主張等同於理解模式的習性（habitus）是，當事者與所處社會空間（social space）長期交互作用的產物，而且家長往往是此種「社會空間」的主要建構者。再者，經濟差異形成高度的群集性，亦即家長建構的「社會空間」屬性具有階級區隔性（Bourdieu, 2000）。因而處於相同場域屬性的群體成員，分享特定型態的「習性」，它反映出共同社會條件的團體性認知架構，以作為與外在事務進行交互作用的依據（Bourdieu, 1990）。林湘慧（2003）的研究發現證實此種關聯性，不同社會階級家長構築出不同屬性的社會空間，中上階級的社會空間傾向於抽象性的文化消費，勞工階級則偏向具體化與實務化。經由此種差異性，不同社會階級孩童發展出不同類型的「習性」，因而對他們的學習表現產生極大的影響。陳珊華（2004）也發現，中上階級學童自小吸納更多的文化刺激，這些文化資本使他們更容易掌握課程內容的屬性，因而有較好的學習表現。

由此而言，家長的價值觀與教育行動構築特定的學習情境，進而使下一代發展出特定的理解模式，此種現象與階級背景存在密切的關聯性。一些研究發現對此種關聯性提供相關的解釋，其要點是大部分勞工階級家長對於教育成就的影響，並未具備清晰的概念，因而並未對學童教育成就抱持高度期望，此種現象源自於工作場域的性質與經驗。白領職務需求更多抽象性內在思維活動與判斷，因而使這類工作者了解到系統性與抽象性知識的重要性，於是中上階級家庭重視與追求「學術性知識」。相反的，勞工階級家庭傾向於強調實務性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的重要性，此種傾向根源

於勞動者工作事務，包含可觀的實務運用特性，致使他們認為「實務性知識」具有優越價值（Willis, 1977）。

再者，工作事務的特性與經驗使得勞動階級家長著重於當前事務。相反的，中上階級家長展現出長期性的規劃，以利於其下一代獲取高級學歷：「一個勞工階級的論述被實際與立即所主宰，並且一個中間階級的論述被理想與優勢所主宰。」（Ball, Bowe & Gewirtz, 1995）

此種「短期主義」源自此類家長的生活，直接依賴勞動生產活動，致使甚少涉及思考性的學術知識，所以學校教育內涵並未與勞動工作生活產生密切關聯，此種疏離使得勞工階級家長無法瞭解教育文憑的重要性，他們關注「短期」的影響，或是「立即」得以實現的利益，因而孩童往往被視為重要的勞動工具（Becker, 1961）。上述價值觀與期望的差異，直接影響父母對教育成就重要性的認知，亦即教育成就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連性，因而對於如何提供下一代的學習情境，不同社會階級家長展現出不同的行動取向。

階級價值觀的差異性也影響家長對學童學習活動的參與度，Reay（1998）的研究發現顯示，中上階級母親清楚認知教育的重要性，因而積極參與孩童的學習。相反的，勞工階級母親卻展現高度的被動性，以往的教育失敗經驗使他們相信，教育成就高低取決於學習者本身的問題，諸如智力、動機與情緒等，此種心理作用明顯降低她們參與孩童學習的動機。

上述分析顯示，工作屬性影響不同階級家長的價值觀，進而展現特定的教育行動，並構築出特定的「社會空間」，所以其下一代發展出特定的理解模式，此種模式能否契合學術性課程大幅影響當事者的學習表現。一般而言，中上階級學生的理解模式較能達到此種契合，此種現象較少出現於勞工階級學生身上，因而中上階級學生的學業成績往往優於勞工階級學生。

三、文化的獨特意義與社會評價

從社會文化的發展情境而言，個別文化孕育於特定的社會情境，個別社會情境有其獨特屬性，因而賦予個別文化的獨特意義。社會歷史發展脈絡又存在高度的不穩定以及偶然性，亦即外在文化的介入或是輸入，可能由於某一偶發事件而產生交融的現象，此種偶發性進而影響社會的開放性程度，也因此影響個別社會文化的發展路徑，所以用共同標準看待個別文化反映出主觀或預設立場的缺失，並忽視社會情境脈絡的動態性（于嘉雲譯，1994）。再從文化建構論的角度而言，個別文化乃是特定群體在特

定情境持續交互作用的產物，此種持續交互作用產生兩種重要意義，其一是使該文化產生動態的發展，同時此種文化建構使參與者能進行意義分享，所以局外人便難以掌握特定文化的深層意義 (Schutz, 1972)。並且此種文化建構與內涵意義分享，產生彼此的團體認同，並成為成員之間的交流途徑，甚至融入彼此的生活內涵 (Tunstall, 1973)。

上述觀點顯示，特別文化發展於特定的時空脈絡，經由成員的參與建構而發展出獨特內涵的文化，所以應以尊重與均等的角度看待個別文化。儘管如此，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卻非如此，大多數人往往展現向強勢文化傾斜的行為模式，甚至以模仿的途徑，以試圖提升自我的身分地位 (Veblen, 1994)。造成此種現象的成因之一是，個體受制於物欲，所以物質報酬能影響社會的價值觀，並進而影響社會成員對特定文化的評價 (Wolff, 1993)。此種物質支配的社會評價往往是階層化社會文化背後的主因，亦即在社會大眾的眼中，個別文化並非處於均等狀態，而是存在高低優劣的型態 (唐宗清譯，1994)。

儘管上述社會評價是既存的事實，但此種社會現象至少存在兩種問題，其一是貶抑特定文化，此種貶抑來自於上述社會評價，將原本均等本質的水平結構，轉向上下優劣之分的垂直結構。然而由於社會價值體系與物質報酬產生密切連結，所以強化支配團體或是中上階級的優勢地位。反過來說，這類團體亦可能試圖以取得社會價值觀支配權的方式，來建構期望的社會主流文化，以達到維持既有優勢的企圖 (Gramsci, 1971)。此種關聯性顯示，特定團體試圖以貶抑其他文化，以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這種貶抑不僅使許多社會大眾接納既存現象，並可能忽略被貶抑文化的內在價值。從上述社會文化建構論或是社會情境發展論的角度而言，個別文化無法脫離其時空脈絡，而且其價值往往與特定時期的社會需求相關聯 (Mosca, 1962)。此種關聯性指向，特定文化的優勢地位並無恆常性，亦即社會情境屬性足以調節個別文化的重要性。因此當前被視為弱勢甚至低劣文化不盡然不會逆轉。原住民文化提供一個強有力的例證，以往被視為低劣的象徵，但現今許多社會大眾反倒較會以文化獨特性的角度看待原住民文化。此種動態性彰顯出，當前弱勢文化並非源自於本質性的缺失，而是主觀性甚至支配意圖的產物。由此而言，新移民家庭便處於此種不公平的地位，其文化弱勢並非本質性的缺失，而是支配團體打壓的產物。此種貶抑也使許多社會大眾以負面角度看待新移民文化，因而忽視其文化的獨特社會功能，包括：文化層面的多元化，甚至足以產生商業利益的文化活動，以及產生外交政治功能的跨國文化交流，這部分也是既有外交人員最欠缺的文化能力，諸如語言與文化素養。

四、新移民子女的概況

近年來新移民子女的數量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在 1998 年首次有統計資料時，此類的新生兒尚不及 15,000 人(13,904)，在當年新生兒總數的比重僅為 5.12%，但是在 2000 年時便突破 2 萬人(23,239)，佔全國新生兒總數 7.61%，這一數據在 2003 年達到 30,348 人的高峰，占當年新生兒的比率達 13.37%，之後數量雖然有下滑的趨勢，但是新移民子女人數在新生兒總數中仍維持 10% 以上的比重，到了 2008 年新移民子女持續下滑，所佔比率再跌破 10% (9.6%)，2014 年則佔有 6.58%。歷年新移民子女佔全國新生兒人數比率參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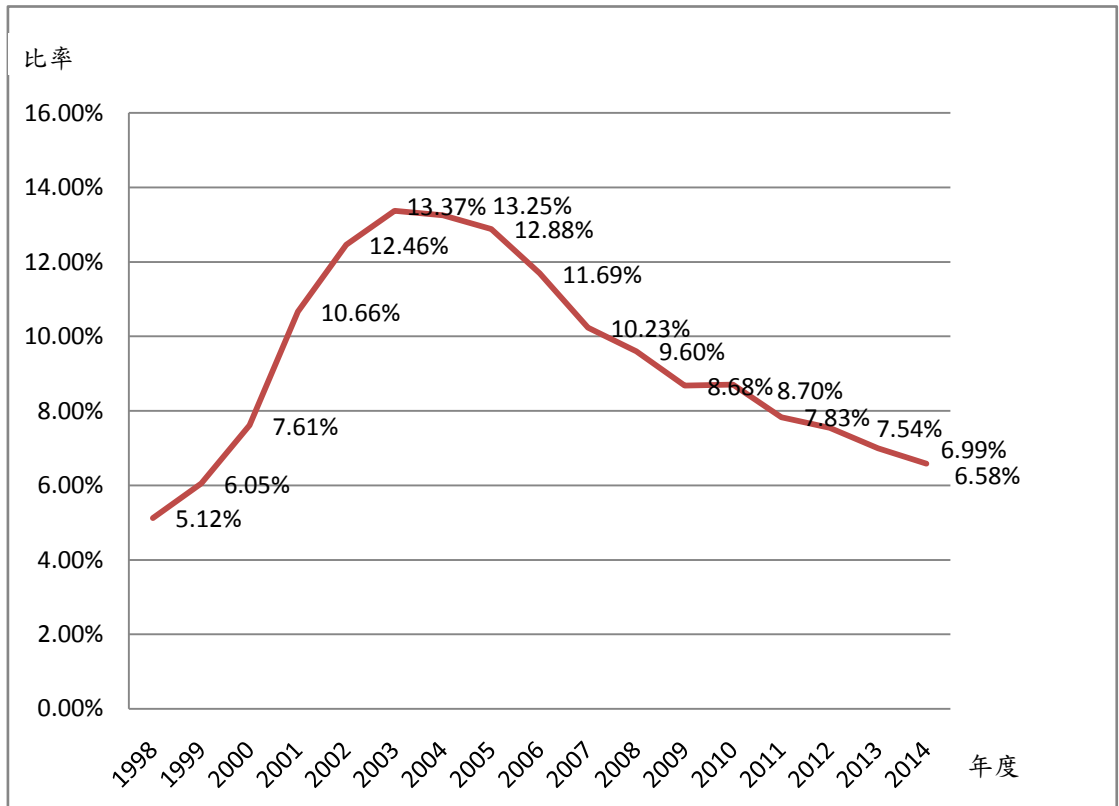


圖 1. 歷年新移民子女佔全國新生兒人數比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4）

上述數據顯示，新移民子女在新生兒總數占一定的比重，並且隨著新移民子女達到就學年齡，亦進一步影響國中小學生的家庭背景組合，圖 2 的數據顯示，在國小與國中的學生背景中，新移民子女所占的比重有逐年升高的趨勢，在國小階段，93 學年度時，僅為 2.17%，但是到 102 學年度時，已達 12.14%。國中階段雖然比重較低，在 93 學年度僅佔 0.58%，但是隨著就學階段的逐漸推移，其比重亦已明顯上升，到了 102 學年度已達 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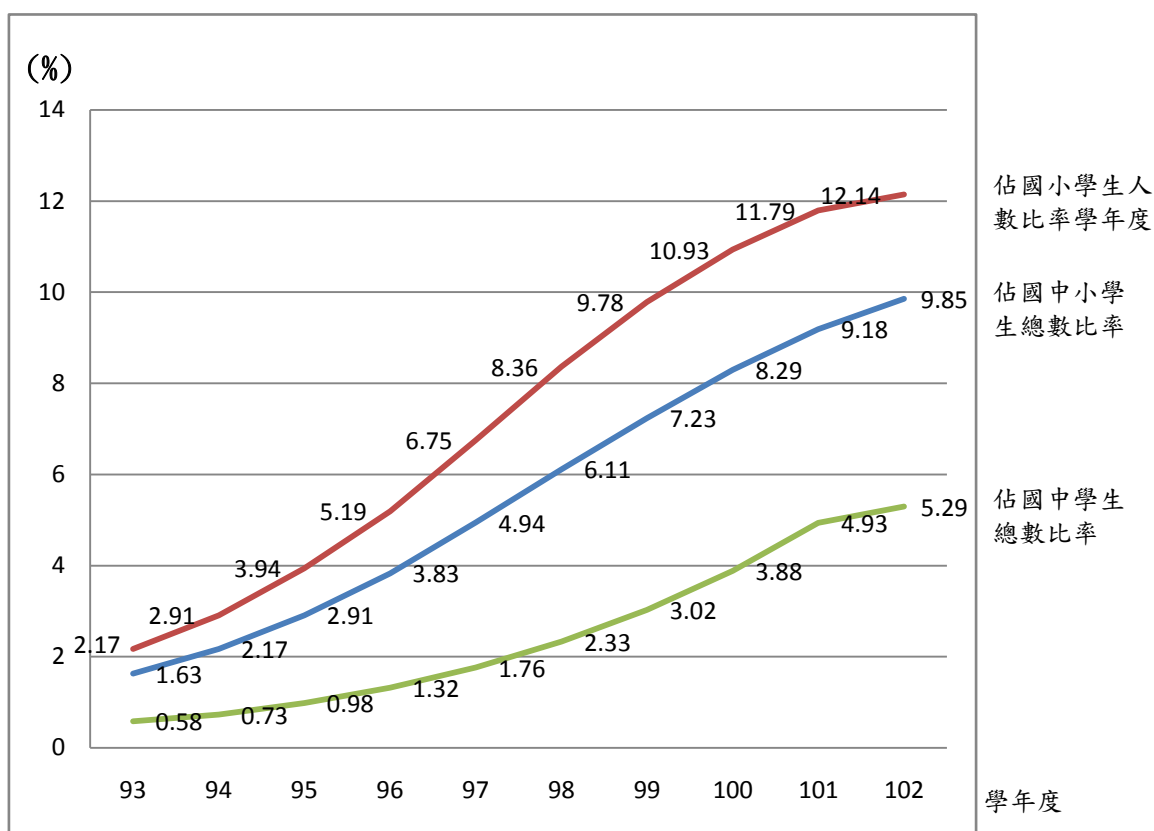


圖2. 歷年新移民子女佔全國國中小學生數、國中學生數、國小學生數比率
資料來源：依教育部（2014）繪製

上述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出，新移民子女數量可觀，但其家庭背景大都屬於勞工階級，先前的文化再製理論已說明，家庭提供的學習刺激環境，將影響子女對課程內容的理解能力，進而影響其學習表現。由於新移民子女大都出生於勞動家庭，所以處於

文化不利的生長環境，致使影響其日後的學習表現。系列性的研究發現顯示，大部分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表現不佳。張慧貞（2004）針對高雄市國小 4 年級學生，選取新移民及非新移民配偶子女各 50 名，進行數感測驗，研究結果顯示，新移民子女的測驗分數顯著低於非新移民子女。更為大型的調查研究發現也脫離不了此種特性，例如何美瑤（2006）針對臺北縣市國小的中年級學生，抽取 1,151 位進行調查，並對 12 位教師、28 位學生進行訪談。研究結果顯示，東南亞籍配偶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最差，中國籍配偶子女次之，本國籍配偶子女最好。該研究同時發現，產生差異的成因是家庭提供的文化資源，東南亞籍家庭在此方面最為薄弱，我國籍的家庭最為充足。相關研究亦顯示，新移民無法對其子女進行積極性的教育參與。黃建銘（2005）便指出新移民因為識字能力有限，無法直接閱讀學校傳遞的資訊，必須靠他人或子女轉譯，有訊息遭扭曲的可能，因而無法準確掌握子女的學習情形。另一成因是，這類家長並未擁有適當的教育方法，往往採取權威的管教方式。王光宗（2004）便指出，新移民母親在子女入學後，雖然亦是全心照料子女成長，卻常感有心無力，打罵是最常用的管教技巧，且無法充分教導孩子學習。儘管上述研究指向，社會文化不利因素的影響性，但是許多社會大眾甚至教育工作者並不瞭解此種關聯性，反倒以心智能力的觀點看待此種現象，因而可能造成比馬龍效應（Pygmalion）（Rosenthal & Jacobson, 1968）。周秀潔（2004）的訪談研究便顯示出此種連結，研究發現顯示，教育行政措施隱含新移民配偶污名化的標記，傾向視為需要社會扶助的對象，例如 1995 年實行的教育優先區計畫，便首先將「外籍配偶子女比例偏高之學校」，與「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子女比率偏高之學校」，同列為可以申請教育優先區的條件之一。

上述研究發現不僅指出，新移民子女學習表現不理想，同時指向這是一種社會現象，亦即由於此類家庭大都屬於勞工階級，因而欠缺足夠的經濟資本、教養方法與時間，導致無法提供其子女較理想的學習情境，文化刺激不足下便難以發展出能銜接學術性課程的理解能力，並且學習表現不佳容易導致社會大眾的偏見。

參、研究設計與進度

一、研究方法與樣本分析

經由上述各段落已闡述的問題背景、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已歸結出本研究將探討新移民子女的學習困境，以及其家庭的潛在優勢要素，為達成此一研究目的，在方法的運用上，本研究將有如下作法。

(一) 研究方法

1. 問卷調查法

編擬「東南亞籍新移民子女學習現況調查問卷」，問卷內容除基本資本外，共分為三大層面，分別是「對新移民子女學習與生活表現之認知」、「對影響新移民子女學業表現的成因之認知」，以及「對新移民子女獨特優勢條件之認知」。

草擬問卷後，隨即召開專家諮詢會議，邀請三位對新移民子女學習議題，學習專精，研究經驗豐富的專家學者，就問卷之構念層面、題目概念歸屬之適切性逐一進行深入探討，提供修訂建議。完成的後的正式問卷合計 53 小題，用以了解受測樣本教師在各項子題的看法。

樣本選取乃針對全國國小教師總數，依所在區域分為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等五區，再從各區域中就都會人口集中區、都會市郊區、鄉村地區及偏遠地區等地理位置，各涵蓋 6 班以下、7-12 班、13-24 班、及 25 班以上等四種類型，進行分層隨機取樣，合計發出 1911 份問卷，各分區抽樣情形請參見表 1。

表 1.

各分區樣本抽樣分配表

	北	中	南	東	離島	數量
寄出	833	386	518	70	104	1911

進行分析時，首先計算各題得分，「非常同意」為五分，「同意」為四分，「普通」三分，「不同意」二分，「非常不同意」則為一分，並加總各層面總分，作為統計分析依據，包括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性別變項在各構面的知覺是否有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則以個人變項和學校變項為自變項，考驗是否對其各構面的知覺有顯著差異，並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2.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並同時要了解新移民家庭的潛在學習優勢要素，這部分則是舉辦北南東三區共三場，邀請新移民子女導師 25 位，新移民媽媽 5 位，共 30 位參與焦點團體座談，分別從「學習表現情形」、「影響學習表現的因素」以及「可能的學習優勢」等三層面，探詢參與者的意見。新移民媽媽扮演直接訊息的提供者，導師則可從旁觀者的角度提供相關的心得。每場座談會進行約二小時，並全程進行錄音，會後再謄寫逐字稿，並進行內容分析，以解讀其中所隱含的意義，語料呈現編碼為（區別，語料頁碼行數起迄），例如（東區，P2L23-26），即表示該引文語料是取自東區座談會逐字稿第 2 頁第 23-26 行。

（二）樣本分析

1.問卷回收

依分區取樣共發出問卷 1911 份，回收 1314 份，總回收率達 68.8%，各分區回收情形請參見表 2。

表 2.

各分區取樣及回收情形表

	北	中	南	東	離島	數量
寄出	833	386	518	70	104	1911
回收	513	232	417	55	97	1314
回收率	61.6%	60.1%	80.5%	78.6%	93.3%	68.8%

2.樣本背景分析

本問卷總計共回收 1314 份問卷，樣本背景分析如表 3。

表 3.

樣本背景分析表

類別	性別		學歷				服務年資							職位				任教年級			學校規模				學校區域				任教新移民子女經驗		
	男	女	研究所		大學		師專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25年	26-30年	31年以上	主任	組長	導師	科任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6班以下	7-12班	13-24班	25班以上	都會人口集中區	都會市郊區	鄉村區	偏遠地區	有	無
			一般校院	教育類科	一般學系	教育學系																									
數量	382	879	97	231	137	311	20	155	255	358	221	197	67	13	116	190	777	185	378	530	562	186	154	222	704	379	404	308	176	1116	82
比率	29.9	68.7	12.2	29.0	17.2	39.1	2.5	12.2	20.1	28.3	17.5	15.6	5.3	1	9.1	15.0	61.3	14.6	29.6	41.4	43.9	14.7	12.2	17.5	55.6	29.9	31.9	24.3	13.9	93.2	6.8

就性別而言，男性占 29.9%，女性約 68.7%，以女性教師居多，符合一般認知；在學歷方面，具研究所學歷者合佔 41.2%，其中就讀一般校院則為 12.2%，教育相關研究所者則為 29%、具大學學歷者為 56.3%，其中就讀一般大學科系者佔 17.2%，就讀教育科系者則為 39.1%、具師專學歷者則僅為 2.5%；在服務年資方面，屬 1-5 年年資者有 12.2%、6-10 年者佔 20.1%、11-15 年者有 28.3%、16-20 年者為 17.5%、21-25 年年資有 15.6%、26-30 年者有 5.3%、30 年年資以上者僅佔 1%；在擔任職務方面，9.1%的教師兼任主任、15.0%兼任組長、61.3%為級任導師，另有 14.6%為科任教師；在任教年級方面，擔任一年級教學工作者有 29.6%、中年級者 41.4%、高年級者為 43.9%；在學校規模方面，有 14.7%的教師服務於 6 班以下學校、12.2%的教師則服務於 7-12 班規模的學校、服務於 25 班以上學校者則有 55.6%；在學校所在區域方面，於都會人口集中區服務者佔 29.9%、都會市郊區者則佔 31.9%、服務於鄉村學校者則有 24.3%、在偏遠地區服務者則為 13.9%；在有無任教新移民子女經驗方面，有任教經驗者為 93.2%、無任教經驗者佔 6.8%。

(三) 問卷信度

全部問卷 53 題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為 .98，顯示本問卷為具有良好信度的測量工具。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採行問卷調查法及焦點座談蒐集資料，以下分別呈現問卷調查及訪談所得之研究結果，並進行討論。

一、結果分析

(一) 不同性別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形的看法並無差異

首先進行 Levene 的同質性檢定未達顯著，顯示男女教師兩組內部的離散情形並無明顯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F=1.93$ ， $df=1$ ， $p=.17$ ，亦未達顯著，這一結果顯示，雖然女教師平均來說對新移民子女持有較正面的看法，但男女教師的差異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表 4

不同性別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況認知之變異數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942	1	.942	1.931	.165
組內	613.891	1259	.488		
總和	614.832	1260			

註:* $p < .05$

(二) 不同學歷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學習情況看法有所差異

Levene 同質性檢定達顯著 ($p = .045$)，顯示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內部的離散情形有明顯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F = 5.274$ ， $df = 4$ ， $p < .001$ ，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不同學歷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不同。

由於 Levene 檢定達顯著水準，接下來進行事後比較如下表 5。

表 5

不同學歷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況認知之變異數分析表

(I) 學歷	(J) 學歷	平均差異 (I-J)	顯著性
非教育類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28828*	.010
	大學非教育科系	-.32968*	.007
	大學教育系	-.36741*	.000
	師專	-.36084	.654
教育研究所	非教育類研究所	.28828*	.010
	大學非教育科系	-.04140	1.000
	大學教育系	-.07913	.859
	師專	-.07256	1.000
大學非教育科系	非教育類研究所	.32968*	.007
	教育研究所	.04140	1.000
	大學教育系	-.03773	1.000
	師專	-.03116	1.000

(I) 學歷	(J) 學歷	平均差異 (I-J)	顯著性
大學教育系	非教育類研究所	.36741*	.000
	教育研究所	.07913	.859
	大學非教育科系	.03773	1.000
	師專	.00657	1.000
師專	非教育類研究所	.36084	.654
	教育研究所	.07256	1.000
	大學非教育科系	.03116	1.000
	大學教育系	-.00657	1.000

註：* $p < .05$

根據上表可知，在對新移民子女的正向態度上，具教育科系大學及研究所學歷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所持的正向態度，顯著高於就讀於非教育相關的一般研究所教師，這一現象的合理解釋是，在教育相關系所的師資培育過程中，的確賦予教師得以察覺隱藏在教育系統中的文化因素，具體指的是教師得以知曉家庭社經背景，及其文化因素是影響新移民子女學習情形的主要因素，而此些因素並不可歸咎於新移民子女的身份，並且此些新移民子女，更可能因為具有多元文化的背景，而具備潛在的學習優勢。

上述資料亦顯示具非教育系所研究所學歷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所持的正向態度低於同樣非教育相關科系的大學學歷教師，也就是就教育系所而言，學歷越高對新移民子女所持的正向態度越高，但對持非教育系所學歷的教師而言，學歷越高對新移民子女卻越傾向持有顯著的負面態度，這一現象可能來自這些自具非教育系/所學歷教師，固然在學歷層級上有所差異，但二者所接受的應都為 40 學分的教育學程，受限於有限的相關課程，仍不足以知曉前述所提及的文化因素與學業成就的關聯性，亦即非教育背景而言，並非具研究所學歷的教師，就比僅有大學學歷教師具有更高的教育知能素養，相反地卻更可能因為接受了更多「科學」系統思維，而更傾向視學習為個人素質的展現等表面可見的因素，而容易忽略了教育過程所潛藏的社會文化因素。

(三) 不同年資教師與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況的看法有差異

Levene 同質性檢定達顯著 ($p=.045$)，顯示不同年資的教師內部的離散情形有明顯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F=2.347$, $df=6$, $p=.029$ ，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不同年資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不同。

由於 Levene 檢定達顯著水準，接下來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年資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況認知之變異數分析表

(I) 年資	(J) 年資	平均差異 (I-J)	顯著性
1-5年	6-10年	-.07232	.965
	11-15年	-.10187	.770
	16-20年	-.23562*	.040
	21-25年	-.18650	.201
	26-30年	-.13213	.738
	31年以上	-.17311	.978
	6-10年	1-5年	.07232
11-15年		-.02956	.999
16-20年		-.16330	.182
21-25年		-.11419	.614
26-30年		-.05982	.988
31年以上		-.10079	.999
11-15年	1-5年	.10187	.770
	6-10年	.02956	.999
	16-20年	-.13375	.268
	21-25年	-.08463	.790
	26-30年	-.03026	1.000
	31年以上	-.07123	1.000
16-20年	1-5年	.23562*	.040
	6-10年	.16330	.182
	11-15年	.13375	.268
	21-25年	.04912	.991
	26-30年	.10348	.848
	31年以上	.06251	1.000
21-25年	1-5年	.18650	.201
	6-10年	.11419	.614
	11-15年	.08463	.790
	16-20年	-.04912	.991
	26-30年	.05437	.993
	31年以上	.01340	1.000
26-30年	1-5年	.13213	.738
	6-10年	.05982	.988
	11-15年	.03026	1.000

(I) 年資	(J) 年資	平均差異 (I-J)	顯著性
	16-20年	-.10348	.848
	21-25年	-.05437	.993
	31年以上	-.04097	1.000
	1-5年	.17311	.978
	6-10年	.10079	.999
31年以上	11-15年	.07123	1.000
	16-20年	-.06251	1.000
	21-25年	-.01340	1.000
	26-30年	.04097	1.000

註：* $p < .05$

根據事後比較的結果，只一組有明顯的差異，即是 16-20 年年資的教師的態度在統計上顯著高於年資只有 1-5 年的教師。

同時觀察各組平均數的變化，可以發現一般來說，對新移民子女的態度隨年資的增加而變好，然而年資 21 年以上的教師卻隨年資的增加而降低對新移民子女的正向態度。推測隨著年資的增加，教師有更多的教學經驗瞭解到新移民子女的學習潛力。而年資 21 年以上反向減少的原因，推測可能是與接觸新移民子女的經驗或和是否有接受關於新移民子女的知識有關。因為新移民子女的在校園大量增加是在近十餘年才形成的現象，而部分年資稍長的教師，沒有機會在專業養成的階段，對新移民子女的特質有適當的瞭解。

然而由於上述的分析只考量到「年資」單一變數，應還再要透過進一步的分析，才能對其他可能的因素有較正確的了解，例如教師專業發展階序，特別是上述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正向態度，隨著年資先成長而後降低的現象，亦符合一般對教師專業發展趨勢的研究結果。例如 DeMounlin & Guyton (1988) 針對 160 位教師及校長進行問卷調查顯示，教師的專業發展可分為充滿教育熱情，樂於吸收新知的「預備階段」、教學效能提高，師生關係良好的「發展階段」、教學工作滿意度開始衰退，內在動機減少的「轉換階段」，以及自我成長意願降低，專業度下降的「衰退階段」等。

Fessler (1985) 則從個人環境和組織環境的角度，將教師生涯發展分為八個階段，包括師資培育時期的「前備階段」、初任教的「引導階段」、專業能力開始建立的「能力建立階段」、具高度熱忱，努力追求專業成長的「熱忱與成長階段」，到了後半時期後教師開始感到挫折，進入「生涯挫折階段」此後教師專業發展呈現停滯現象，將教學視為例行公事，是為「穩定與停滯的階段」，到了教師生涯的後期，教師已開始準備

要離開職場，進入「生涯低落階段」，最後則是「生涯落幕階段」教師因退休或另有生涯規劃而離開教師崗位，結束教師工作。

上述的研究均顯示，教師專業發展會隨著教師任教年資的增加及經驗的累積，而有先成長後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這一現象應與教學行業的專業發展高度仰賴經驗累積及自我省思有關。

初任教師因經驗不足，在進入教學現場後，隨著經驗的增加得以快速提升其專業程度，及至生涯中期已熟稔各項教學事務而達至專業度的高峰，之後教學事務漸成例行事務，若教師未能持續進修吸收新知，提升反思能力，那麼專業發展將呈現停滯現象，及至職業生涯後期，專業已內化為個人習性，僵化成為內心信念的反射，而不再是依據任教對象或社會脈動進行調整的反思性判斷行為（姜添輝，2004；Lortie, 1975）

（四）不同職位教師與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形之認知沒有差異

Levene 同質性檢定未達顯著 ($p=.318$)，顯示不同職位的教師內部的離散情形沒有明顯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F=1.157$ ， $df=3$ ， $p=.325$ ，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不同職位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並無不同。這一現象應與國小各行政職務主要是由教師兼任有關，由於身為教師皆肩有教學責任，因此並不會因擔任行政職務就缺乏與新移民子女接觸的機會。

表 7

不同職位教師與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1.695	3	.565	1.157	.325
組內	616.941	1264	.488		
總和	618.636	1267			

註：* $p<.05$

（五）不同學校規模（班級數）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有所差異

Levene 同質性檢定達顯著 ($p<.001$)，顯示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內部的離散情形有明顯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F=8.723$ ， $df=3$ ， $p<.001$ ，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不同。

由於 Levene 檢定達顯著水準，接下來進行事後比較。

表 8

不同學校規模（班級數）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是否有差異多重比較

(I) 學校規模	(J) 學校規模	平均差異(I-J)	標準誤差	顯著性
6班以下	7-12班	.2843*	.08035	.003
	13-24班	.1054	.06557	.497
	25班以上	-.0149	.05535	1.000
7-12班	6班以下	-.2843*	.08035	.003
	13-24班	-.1789	.07728	.121
	25班以上	-.2992*	.06883	.000
13-24班	6班以下	-.1054	.06557	.497
	7-12班	.1789	.07728	.121
	25班以上	-.1203	.05079	.105
以上25班	6班以下	.0149	.05535	1.000
	7-12班	.2992*	.06883	.000
	13-24班	.1203	.05079	.105

註：* $p < .05$

由表 8 數據顯示，不同規模學校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況的認知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在 7-12 班小校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能力最不肯定，而在更小的學校，反而又對新移民子女有較佳的印象，同時，在 25 班以上學校的教師，也對新移民子女有較佳的印象。亦即在小型及大型學校對新移民子女有較高的肯定，而中型學校則無，這一現象應與教資源分配有關。

我國教育資源的分配包括經費以及人力編制，主要是依據學校的規模大小進行配置，而 25 班往往是重要的分界點，以《臺南市中小教職員工員額編制標準》而言，在處室配置方面，13-24 為三處室，25 班以上則增為四處室，在業務承辦組長方面，13-18 班及 18-24 班分別為 7 人及 8 人，到了 25 班-36 班則大幅增加為 12 人，37 班以上則再小幅增加 1 人，即使是新修訂的《國民教育法》新增專任輔導人員，其編制起始點亦以 24 班為界，亦即 25 班以上學校在現行的各項法規制度中，得以分配較多的資源，而得以協助新移民子女縮短可能的學習弱勢，而有助於提升學習表現。

至於 6 班以小學校通常為偏遠小校，政府為縮短城鄉差距，近年來已投入大量資

源推行教育優先區、課後扶助、補救教學計畫等，因此無論是學校或新移民子女個人，均得以在此些額外提供的資源資中獲得協助，亦有助於提升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表現，再者較少的班級人數，亦有助於師生互動，而增加教師對影響新移民子女學習成就表現因素的了解。

(六) 不同區域學校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況看法有所差異

Levene 同質性檢定達顯著 ($p<.001$)，顯示各區域的教師內部的離散情形有明顯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F=24.051$ ， $df=3$ ， $p<.001$ ，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在不同區域任教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不同。

由於 Levene 檢定達顯著水準，接下來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不同區域學校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形認知變異數分析表

(I) 所在地	(J) 所在地	平均差異(I-J)	顯著性
都會	郊區	.26645*	.000
	鄉村	.42596*	.000
	偏遠	.13711	.115
郊區	都會	-.26645*	.000
	鄉村	.15950*	.026
	偏遠	-.12934	.229
鄉村	都會	-.42596*	.000
	郊區	-.15950*	.026
	偏遠	-.28885*	.000
偏遠	都會	-.13711	.115
	郊區	.12934	.229
	鄉村	.28885*	.000

註：* $p<.05$

根據上表事後比較分析可知，在對新移民子女的正向態度上，都會>郊區>鄉村，偏遠>鄉村。雖然無法區分得知偏遠與都會，以及偏遠與郊區的教師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但是從都會、郊區、鄉村來看，似乎越往都會地區，教師對新移民子女越趨正向。但是，偏遠地區相較鄉村地區的教師，似乎對新移民子女更正向看待。

上述不同區域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形的看法，應與學校規模有關，因為都會區學校多為大型學校，而偏遠地區則多為小校，至於鄉村地區則以中型學校為主，因此都會區與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對新移民子女所持有的較正面態度，一如大型學校與小型學校，因擁有較多正式與額外資源，而得以對新移民子女提供必要協助有關，而中型學校則處因人數較少未能分配較多資源，又因未處偏遠地區，亦未能獲取額外資源，相形之下能給予新移民子女的協助將較為有限。

(七) 有無教過新移民子女教師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形認知有所差異

Levene 同質性檢定達顯著 ($p=.002$)，顯示兩組教師內部的離散情形有明顯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F=5.435$ ， $df=1$ ， $p=.02$ ，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有教過跟沒教過新移民子女的教師對新移民子女的看法不同。而由兩組的平均數有任教經驗教師為 3.25，無任教經驗教師為 3.42 可知，沒有教過新移民子女的老師對於新移民子女的態度是較正向的。這一現象應與任教年資有關，進一步分析未具任教新移民子女經驗之教師年資，15 年以下年資者佔 55.6%，對照前述教師專業發展歷程而言，這一階段教師正處於教師專業的發展期，對教育事業抱持有高度的熱忱，亦正處於進修的高峰期，推測將因此得以接受較多，且較深刻教育理論，而得以對新移民子女持有較為正向的看法。

表 10

有無任教新移民子女經驗對新移民子女學習情形認知變異數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2.692	1	2.692	5.435	.020
組內	592.360	1196	.495		
總和	595.052	1197			

註：* $p<.05$

二、焦點座談

以下進一步針對焦點座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並提出研究結果。

(一) 新移民子女的學習狀況

1. 新移民子女學習情形並未呈現一致趨勢

依受訪教師的實際觀察，新移民子女的學習情形，無論是在學習所需基礎能力的學習準備度上，或分組活動參與、作業繳交，乃至於學科學習成就等面向，並未有系統性地低於本籍他學生的現象，而是同其他學生呈現出個別差異，至於行為常規方面，亦與其他學生的表現未有明顯的不同。這一結果與許誌庭（2014）針對 702 篇有關南洋籍婚姻移民有關的學位論文所進行的後設分析相同。該研究指出，儘管多數研究以移民子女學業成就較低為假設考驗，但並未達成一致的結果，特別是當控制了新移民學童的家庭社經背景後，新移民子女的學業成就，與其他學童的表現並無差別。多位受訪老師便提到了這種現象，

「有一個媽媽，媽媽跟我接觸的時候，他就是非常有禮貌，態度也很謙虛，他非常重視學習…我就教媽媽查字典，就是教完生字要查語詞…，小朋友寫的很多，她就請他爸爸再看一遍，結果爸爸就檢查出來，所以小朋友他是很努力的在寫，而且他的功課也非常好，我們班每次選模範生都是他。」(南區，P14L14-30)

「我現在教的三年級和之前的五年級，新住民就有兩個小孩一個考第一名一個考前三名，然後他的功課真的是很好。對，根本看不出來他是，他也沒有口音，然後就是家長對他的態度我覺得是好的。…現在這個班，至少我們班也是六位嘛，我能說有三個功課是好的，然後他一樣是東南亞國籍，而且那種好法是真的好。…然後他沒有語言上的障礙，然後有的媽媽甚至也是來學校當志工，所以他的參與度是高的，所以你只要家長參與度是高，不要太抗拒的時候，或是不要不參與的時候…」(北區 P5L32-P6L1)

至於那些學習成就較低者，呈現何種樣態？首先在學習能力方面，受訪教師指出新移民學生在概念理解能力（南區，P2L5-6），作文能力較差，語不成句、講解數學概念，心不在焉（南區，P2L30-31）、懶得想，沒耐心（南區，P3L10）、對抽象概念的理

解比較有問題、比較不理解「我們」的語言和語句（南區，P3L28-29）、咬字比較不清楚（南區，P4L16）、穿著簡陋不乾淨（南區，P5L20）、字不好看（北區，P2L16）、資質較差（北區，P2L25）。至於行為常規方面，根據受訪教師的觀察顯示，害羞低調，缺乏自信（北區，P5L22）、與同學較多爭執（南區，P3L25）

歸結教師觀察，新移民子女無論是在學業表現，或是行為常規方面，與其他非新移民子女學童相較而言，並未有明顯的落後現象，而是存在著個別差異，這一結果指向單一的新移民身份並非是絕對的影響因素，尚存有其他影響因素。至於學習狀況不佳的新移民子女學童，其學習困境則呈現多元樣態，以下進一步訪談教師，以了解教師是如何解釋導致新移民子女學習弱勢之成因為何？又是否與其新移民身份有關？

（二）影響新移民子女學習成就的因素

訪談結果顯示教師普遍認為新移民子女的學習狀況呈現出個別差異，亦即並非所有的新移民子女，皆呈現出學習弱勢的現象，有些新移民子女仍表現得相當優異。

進一步針對新移民子女學習弱勢者可能原因為何？又是否與其新移民的身份有關？進行訪談，茲將教師的觀點歸納如下：

1. 有限的母職功能

新移民母親是否具有足夠能力扮演好母職角色，一直被視為是影響新移民學生學業成就的主要因素（許誌庭，2014），受訪教師普遍認為，新移民母親語言能力較弱，沒有辦法輔導子女功課（南區，P10L22-23），一位馬來西亞籍母親便提到他們在指導子女課業時所遇到的困境，亦證實了教師們的觀察：

「我們注音是比較差一點，我女兒就是有這樣感覺，就是女兒在學注音的時候，我們以前是有碰過注音怎麼唸，可是跟臺灣的教法不一樣，後來我們是小朋友在上小學以前再讓他在唸正音班，對，上小學以前就讓她念正音班，可是學校教的功課回來，大部分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教，在注音方面」（東區，P2L23-26）

除了無法提供直接而具體的協助外，新移民母親亦無法適時從教師的書面意見回饋中，了解子女學習問題所在，文靜老師提及：

「我在跟他媽媽溝通的時候，會說聽不懂，都來這麼多年了，但我跟她

對話還是會覺得雞同鴨講，最近比較嚴重的是他拿鹽酸在玩，還好是沒有發生事情，當下跟他媽媽講，可能她也不知道。」(南區訪談紀錄，P11L37-P12L1)

2.未獲得適當的母職權威

上述肇因於新移民母親因語言文字能力不足，以致無法進行適切的親師溝通以及課業指導，這一教養能力的缺乏，就母親應負責教養子女責任的傳統文化看來，將被視為不稱職的母親，進而遭到剝奪教養子女的機會，麗容老師以她班上的例子指出：

「…太太不用上班是印尼籍的，然後先生說他把孩子從小就給別人帶，我說為什麼不要讓她（媽媽）自己帶，孩子親子關係會更好，他說我不相信她。我覺得夫家對新移民的認同就會很直接地去影響，雖然這新移民在我看來她是很OK沒有問題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夫家就是不給予認同，再來就是，婆媳之間比如說阿公阿嬤，很強勢的要用他的那種管教方式，他可能不讓媳婦來介入，那久而久之，新移民本身他就會缺乏自信，那在缺乏自信底下就會影響她整個親子教育，也會影響子女在生活常規上的表現。」(北區，P6L38-P7L7)

引文中教師指出新移民母親未能獲得丈夫、公婆的信任，而被剝奪教養子女的機會，甚至有些公婆為了避免新移民母親教導子女母國語言，而禁止新移民母親接觸子女，

「在這邊上課遇到，因為有些新移民他會來訴苦，他會說怎麼辦阿，她婆婆不讓她接觸孩子啊，不讓她教孩子什麼印尼語什麼越南語阿等等阿。」(北區，P7L16-17)

就在新移民母親缺乏教導子女課業能力，以及被視為低劣他者的形象下，新移民母親面臨著缺乏權威性，以致於母職角色難以發揮的窘境，因而即使獲教師告知孩子應加強教導之處時，亦未能扮演監督要求的角色，以致於學生的學習弱點，未能透過家庭的力量加以導正，淑文教師提到：

我們班表現比較弱的學生的父親好像也不是很認同他的母親，變得說母親在家裡的地位不高，他講的話就是孩子也不太會聽，變成他來接送孩子上放學，我們跟母親講他作業上怎麼樣怎麼樣，希望他回去可以做怎樣的練習，可能母親的權威性是很低的，所以變成孩子不太去聽媽媽講的話，媽媽給我們的感覺顯現出來也就是很無奈，他沒辦法去對孩子做任何的要求。(南區，P6L18-23)

除了家中長輩未能適時賦予新移民母親管教權威外，前述段落提及新移民母親普遍缺乏指導子女課業的能力，不僅影響到子女的課業成績，亦同時降低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地位，彥瑞媽媽提出她自己的經驗：

「現在的小孩子很聰明，他自己會知道，他要做功課的時候，我說媽媽看一下，她說妳又不懂我們的字，妳要怎麼教阿，實在覺得心很傷，他都很聰明都會知道」(東區，P4L21-22)

立人媽媽也有相同的經驗：

「因為我孩子是會去問老師，那其他有什麼問題回來再問我，我說我不知道，他說為什麼媽媽妳沒有讀書?」(東區訪談紀錄，P4L38-39)

上述引文指向新移民學童，因未能從媽媽處得到如同其他同學所能獲得協助，進一步強化了上述父親及長輩對新移民母親低劣他者的建構。

歸結而言，新移民母親因母國文化屬性差異，缺乏教導子女課業的能力，因而被視為母職角色扮演不佳，又因被視為低階文化的承繼者，唯恐在教養子女的過程，此些低階文化污染了新移民子女，降低人口素質，因而新移民母親未能受到夫家重視，並賦予應有的教養權威，甚至剝奪教養子女的機會，而將其新移民母親角色限縮在傳宗接代工具(范婕滢，2005)，這一現象再聯結新移民子女多為勞工階級家庭，家庭能教養子女的資源原就不足，當新移民母親因上述種種原因未能充分發揮母職功能時，新移民學童的學習成就將較其他群體學童遭到更多的阻力。

三、探討新移民子女家庭潛在優勢要素

除了上述肇因於新移民母親課業指導能力的不足，導致母職功能未能充分發揮，以致於影響到新移民學童學業成就外。若從文化的積極面向來看，一種文化是一種世界觀的呈現，因此具備多元文化能力，便如同擁有多種觀看世界的角度，此種能力是當前全球化浪潮下所形成世界經濟體系最為需要者，因此新移民子女先天上即具備有學習多元文化的優勢機會，而有助於提升學習成就，部分教師在訪談中亦提出類似的觀察，昇玉老師提及她利用課堂教導多元文化的經驗：

「有一次我上社會課，講到越南，那個小孩媽媽是越南籍的，請媽媽到學校教做越南春捲，等到媽媽來的時候，我當然是希望除了做春捲，還有能夠有其他的話題，所以我有請學生提幾個問題來問那位家長，直到那一刻，平常很害羞內向的小朋友，就是會幫媽媽補充越南的馬路和這邊有什麼不一樣，逢年過節有什麼不一樣，……女生本來是個很害羞的小孩，再提問的那一刻，他就有比較多的想法和意見分享，就覺得他在那天好像就變成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人，他平常在學校他是比較弱勢的，語文的能力不是很好，造成數學的能力也不是很好，所以到那天你會發現他好像有閃閃發光的感覺……。」（東區，P6L29- P7L1）

引文顯示，當教師能善用新移民子女所具有的多元文化潛在學習優勢時，將能提供此些學童成功的學習經驗，進而提升學習動機。

然而即使教師願意提供有助新移民子女發揮學習潛在優勢的學習機會，仍有賴此些學童已具備相當程度的母親母國文化能力，才得以發揮效果，淑文教師提供了另一種例子：

「我上課的時候，就用另外一種方式，我就跟我們班的新移民子女小朋友說，你們很棒耶！你們不只會國語和臺語，你們還會越南語，這連老師都不會耶！我就說你們以後擁有更多的資源，我就問他們，你可以講你會的越南語，不管是什麼語都可以，你講給老師聽，給同學聽，然後我發現他們會講的非常非常有限，我現在教的小孩子是三年級，如果小時候媽媽有給他教，他是可以講一段或是一個句子，可是我看他們不太會講，勉強講出來的是一

個詞彙。」(南區, P13L1-7)

亦即即使教師運用了有限的課程時間，提供新移民學童得以發揮潛在學習優勢的機會，卻受限於新移民學童對母親母國文化所知有限的困境，而此一現象從前述段落已提及的因素可知，主要是臺灣社會普遍未能察覺新移民文化，對臺灣社會發展多文化的可能助益，而是將之視為低階文化，甚至禁止新移民學童學習。

陸、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不同學歷、年資、學校規模、區域及有無任教經驗之教師，對新移民學童學習情形的看法有所差異，性別、職位則沒有差異

學歷的影響性顯現在教育專業知能的充與否，因此當修習的是教育相關系所時，學歷越高對新移民子女越持有正向態度，反之若為非教育系所，而是修習教育學程學分者，高學歷反而強化了個人特質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社會文化的影響。

年資的影響則是與教師生涯發展呈現先高後低的現象有所連結，對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觀點，依年資低高，先持有正向態度而後趨向負面態度，其分界點以 20 年年資為界，這一結果亦符合新移民子女達學齡階段進入學校就讀的時間。

學校所在區域則呈現越往都會對新移民子女的學習持有正向態度，但偏遠程度最高的偏遠地區學校，卻又比鄉村學校教師更持有正向態度，這一結果應與學校規模合併檢視。在規模方面，大型（25 班上）及遍遠小校（6 班以下）較中型學校持有更為正向的看法，而區域與規模二者的共變原因，應與資源分配有關，亦即都會區偏向大型學校，而偏鄉雖多為小校，但卻能有額外的資源挹注，二者皆可提供更多的資源以協助新移民子女學習；鄉村型的中型學校則缺乏此二者的優勢。

(二) 新移民子女的學習狀況存在個別差異

從教師訪談結果來看，教師能察覺新移民學童的學習成就，並未系統性地低於其他非新移民學童，而是呈現出個別的差異，亦即仍然有部分新移民學童，能夠迅速掌握學校課程所傳遞的文化內容，而獲得頗高的學業成就，至於那些處於學習弱勢者，所遭逢的學習困境，則一如其他非新移民學童，呈現出多樣態的問題形式，例如概念理解不清、語文能力不佳、學習態度消極、行為常規偏差等。

（三）家庭功能是影響新移民子女學習成就的主要因素

家庭功能不彰是教師普遍認為影響新移民學童學習成就的主要因素，例如父母忙於工作，未能顧及子女在校的學習情形而加以適時的督導、未能體會教育的價值性，消極看子女學習情形等。換言之，教師們認為如果新移民家庭能發揮正常親職功能，則學童的學習表現並未呈現落後的態勢，甚至在受訪談教師的班上，亦有多位新移民子女的學業成就名列前茅，這一現象亦可說明受訪教師能察覺新移民學童的學習問題，主要是導因於社會結構因素，並非完全是個人資質的推論。然而更具積極意義的是，教師更應該體認到必須承擔起更多轉化社會結構的責任，甚至設計有助開展新移女子，具多元文化優勢潛質的課程教學方案，而非任由家庭因素抵銷學校教育效用。

（四）母職角色的發揮是家庭功能的重要因素

母職角色未能適時發揮是上述家庭功能不彰各種情形中，新移民家庭特別常見的形態，於前述各段落內容中顯示，新移民母親因對我國文化掌握力較為薄弱，以致於未能給予子女適時的指導，再加以夫家亦多以低劣他者來看待新移民母親，致使她們教養權威不足，無法發揮母職角色。就家庭分工而言，母職指的是對子女日常生活的照顧與指導等事務，一般而言主要是由女性即母親擔任，這一角色功能的發揮，對處於學前及學齡階段的兒童特別重要，因為這一時期正是行為常規及學校基礎學力養成的重要時期，若母職未能有效發揮，將影響到子女後續的學習表現，然而母職角色並非不可代替，亦即即使新移民母親未能適時發揮母職功能，若能有其他家庭成員適時填補此一角色空缺，仍能有效協助子女維持一定的學習成果。

在訪談中亦有教師觀察到，有部份的父親能適當取代新移民母親，扮演適當的母職角色，因此在這些案例中，即使新移民母親受限於學業教導能力，學童的學習與行為表現仍不至於過於脫離常軌。

（五）新移民學童的學習潛在優勢未被突顯

在訪談的過程中，教師普遍認為新移民學童的確有學習的潛在優勢，然而這些優勢並未具體呈現在學習的過程中，一者是因為學校受限於課程結構，能提供以使新移民學童發揮潛在學習優勢的機會並不多，二者是即提供了相關的學習機會，新移民學童亦不見得具有發揮此一潛在優勢的能力，例如對母親母國文化了解不夠，甚至排斥學習等。

二、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與結論，本研究建議可進行下列政策，以協助新移民學童脫離學習困境，並進而培養多元文化能力，以為我國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經濟體系提高競爭力。

（一）將新移民視為臺灣多元文化的貢獻者，而非文化貧乏者

俗民社會多將新移民視為文化的貧乏者，認為新移民來臺將成為社會的負擔，而政府的政策走向亦多以救濟的角度為主要的思考。就文化適應的角度而言，提供適時的政策協助有其必要性，卻不應成為唯一的思維，就全球化的潮流來看，文化匯集之地，亦是競爭力之所在，特別是臺灣地處亞洲，就當前國際情勢仍以歐美為主的情況下，若能從匯集亞洲文化做起，當能逐步從邊陲到中心，強化我國國際競爭力。

為此教育政策及學校教育，可再多著重於發揚新移民子女所具有多元文化素養的優勢，例如於學校行事中適時納入相關活動，提供新移民子女表現多元文化優勢的機會。再者，教師亦不應將新移民子女的學業低成就，過度歸因於母親為新移民的身分，而忽略了學校教育可扮演更為積極調控家庭背景的責任。

（二）經費補助新移民子女回母親母國

國家人力素質是全球化經濟體系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表現，而多元文化能力更是其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政府應當掌握為數不少的新移民學童，鼓勵學習母親母國文化，積極培養成為具備多元文化能力的經貿文化與外交人才，而適度經費補助新移民子女返回母親母國，應是可行的作法之一，以解決新移民子女因家庭經濟因素而無法陪同母親返國的困境。

（三）開辦新移民子女母國語言能力檢定

賦予文化能見度及實用性，是提升其價值認同感的有效方法，而開辦新移民學童母親母國語言能力檢定，並做為升學成績評定考量因素，則是具體可行的方式，一方面得以透過升學制度的設計，增加新移民母國語言實用價值，以提高新移民學童學習的意願，另一方面將能在新移民學童學習的過程中，強化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感，藉以儲備我國多元文化人才。

(四) 辦理以新移民家庭為單位的親職教育

家庭是新移民來臺後第一個接觸，也是對其進行再社會化的重要機構，然而由於主要著眼於婚姻關係的建立，這些家庭成員往往較之社會大眾，更易將新移民工具化，視為傳宗接代及家務勞動者，而未能積極協助獲取應有的母職能力，例如允許外出參加增能課程，或是給予地位上的尊重，亦即新移民母親之缺乏母職能力，並非完全肇因於個人能力不足，而是另有家庭因素。因此親職教育的實施對象，應擴及新移民家庭的其他成員，例如父親等，教導應如何協同新移民母親共同教養新移民子女，並給予適度誘因，以提高參與意願。

(五) 開發新移民母國文化教材

從研究結果發現，教師雖然同意新移民學童具有可能的學習潛在優勢，然而受限於課程結構以及教師個人專業，而無主動積極的協助開展，因此主要是以提供表現機會，讓新移民學童得以藉機展現獨特的文化、語言優勢，然而亦如同前已述及，或由於其他家庭成員反對、或由於新移民母親自身亦未能積極教導，致使此些新移民學童普遍並未開展可能的潛在學習優勢。對此，相關單位或可開發相關新移民學童母親母國文化教材或辦理相關研習，供教師參閱及參加，一者可提高教師對新移民學童母親母國文化的認識，以便在課堂教學適時融入，一者亦可提供新移民學童或其他學童做為閱讀文本，以了解新移民學童母親母國文化。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于嘉雲譯(1994)(赫屈著)。文化與道德：人類學中價值觀的相對性。臺北：時報。
- 王文科(1999)。高中資賦優異學生家庭動力之研究。《特殊教育學報》，13，97-151。
- 王光宗(2004)。台南縣東南亞外籍母親在子女入學後母職經驗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嘉義市。
- 內政部(2014)。內政部統計月報-表1-2 現住人口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登記。網址：<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list.htm>。檢索日期 2015 年 4 月 7 日。
- 范婕滢(1995)。我不是來生孩子的：外籍配偶生殖化形象之探討。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北市。
- 何美瑤(2006)。外籍配偶子女學業成就之研究-以文化資本主義的觀點探析。高雄師範

- 大學教育學系。未出版之博士論文，高雄市。
- 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臺北：巨流。
- 林淑玲與馬信行（1983）。家庭社經背景對學前教育機會的影響及學前教育對小學學業成績的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6，19-39。
- 林湘慧（2003）。*家庭社會空間與兒童習性關聯性之研究*。國立臺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 林義男（1993）。國中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父母參與及其學業成就的關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報*，16，157-212。
- 周秀潔（2004）。*外籍配偶子女的學校適應-教師的覺知與應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市。
- 教育部編印（2014）。*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臺北：教育部。
- 姜添輝（2004）。教師是專業或是觀念簡單性的忠誠執行者？文化再製理論的檢證。*教育研究集刊*，49(4)，93-126。
- 姜添輝譯（2005）。全球化：作為比較教育的一個新世界？載於楊深坑（編審）：*比較教育論述之形成*（pp. 85-106）。臺北：高等教育。
- 唐宗清譯（1994）。(K. Harris 著)。*教師與階級*。臺北：桂冠。
- 許誌庭（2000）。*國小教師對文化再製現象的知覺性之研究*。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南市。
- 許誌庭（2014）。學位論文形構南洋籍婚姻移民論述之分析。*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3(2)，頁 1-45。
- 陳珊華（2004）。*小學生文化資本之累積與作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未出版之博士論文，臺北市。
- 張慧貞（2004）。*外籍配偶子女數感表現之研究-以高雄市國小四年級為例*。屏東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屏東縣。
- 楊瑩（1994）。*教育均等---教育社會學的探究*。臺北市：師苑。
-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
- 薛承泰（1996）。影響國初中後教育分流的實證分析：性別、省籍、與家庭背景的差異。*台灣社會學刊*，20，49-84。
- 謝孟穎（2003）。*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關聯性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9(2)，255-287。

黃建銘 (2005)。外籍配偶親師溝通之研究-以幼托園所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中市。

外文部分

- Ball, S.J., Bowe, R. and Gewirtz, S. (1995). Circuits of Schooling: A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 in Social-Class Context. *Sociological Review*, 43(1), 52-78.
- Becker, H.S. (1961). Schools and Systems of Stratification. In A.H. Halsey, J. Floud and C.A. Anderson (eds.). *Edu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Free.
- Blackmore, J. (2006). Localization / Globalization and the Midwife State: Strategic Dilemmas for State Feminism in Education. In H. Lauder, P. Brown, J. Dillabough and A. Halsey (eds.).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 Social Change* (pp. 212-22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ctive Sociolog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 Bowles, S. (1975). Unequal Educa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A.P.M. Coxon and C.L. Jones (eds.). *Social Mobil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owles, S. and Gintis, H.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urrie, J. (2004). The Neo-Liberal Paradigm and Higher Education: A Critique. In J.K. Odin and P.T. Manicas (eds.),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pp. 42-62).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s Press.
- Fessler, R.(1985).A model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P.J. Burke & R. G. Heideman, *Career-long teacher education*. (pp181-193). Springfield, IL: C.C.Thomas.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Lingard, B. (2000). It is and It Isn't: Vernacular Globaliz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and Restructuring. In N.C. Burbules and C.A. Torres (eds.),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 Critical Perspectives* (pp. 79-108). N.Y.: Routledge.
- Lortie, D.C. (1975). *School-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lsey (eds.).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p.247-2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row, R.A. and Torres, C.A. (2000). Th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N.C. Burbules and C.A. Torres (eds.),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p. 27-56). N.Y.: Routledge.
- Olssen, M., Codd, J. and O'Neill, A. (2004). *Education Policy: Globalization, 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 London: Sage.
- Mosca, G. (1962). The Ruling Class. In C.W. Mills (ed.), *Images of Man*. N.Y.: George Braziller.
- Rizvi, F. and Lingard, B. (2006).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OECD's Educational Work.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1, pp. 247 – 260.
- Säfström, C.A. (2005). The European Knowledge Society and the Diminishing State Control of Education: the Case of Sweden.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 (5), pp. 583-593.
- Schutz, A. (1972).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tromquist, N.P. (2002). *Educ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 Tunstall, J. (1973). Work and the Social Life of Fishermen. In P. Worsley (ed.). *Modern Sociology*. London: Penguin.
- Veblen, T. (199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Y.: Dover.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olff, J. (1993).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 (second edition)* .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Policies for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Formulated for Increasing Human Capital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hih-Ting Hsu* Tien-Hui Chiang**

Abstrac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quires a high level of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when trading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Many people living in Southeast Asia immigrate to Taiwan for marriage, and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immigrant children entering the local education system. Despite Taiwan's development into a culturally diverse society, new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are widely regarded as a secondary cultural group. Consequently, the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new-immigrant children is often attributed to their low level of intelligence and inadequate maternal parenting. Taiwanese society often overlooks the sociocultural factors imposed on these families, thereby failing to recognize the potential learning advantages of these children. In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ocus group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elicit the opinions of teachers and new-immigrant families regarding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 new-immigrant children. The assessments investigated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learning and living performance, causes affec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unique 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being a child of new-immigrant parents. The assessments were aimed at determining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faced by such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learning advantages they posses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article offers relevant education policy suggestions for augmenting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new-immigrant children, which would increase the value of Taiwan's human capital and elevate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economy.

Keywords: human capital, new-immigrant children, potential learning advantage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tnkgb@mail.nutn.edu.tw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Evalu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thchiang@mail.stust.edu.tw

